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

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机制与政策研究

WOGUO ZHONGBU DIQU CHENGSHIHUA
QUDONG JINGJI FAZHAN FANGSHI ZHUANBIAN DE
JIZHI YU ZHENGCE YANJIU

张士杰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驱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机制与政策研究

张士杰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与
政策研究/张士杰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141 - 9256 - 8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化 - 影响 - 区域经
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 21②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6385 号

责任编辑: 黄双蓉

责任校对: 王肖楠

责任印制: 邱 天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机制与政策研究

张士杰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0. 75 印张 200000 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9256 - 8 定价: 41.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内 容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分析与研究方兴未艾。我国中部崛起规划实施以后，中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分别就中国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与形成原因、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测算、微观机制、影响因素及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子进行了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提出了中部地区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通过 1978 ~ 2013 年中国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分折，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速度，形成了需求失衡、产业失调、资源环境压力大、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2. 运用组合评价方法，分析了 1978 ~ 2013 年我国整体及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时间演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基本吻合；基于对中国及中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程度的测算，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在转变程度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1 ~ 2 年，且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较全国更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经历了轻度转变、中度偏轻转变到中度偏高转变的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经济发

展动力主导向经济结构或经济能力主导转变。

3.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形成了政治锦标赛，虽然推动了辖区经济增长，但是形成了土地财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而导致中部地区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

4. 对 1978 ~ 2011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程度及要素贡献率的分析及与中部地区的相关结果的对比表明，投资与自然资源投入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城镇化将成为资源约束从紧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

5. 中部六省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均是正向作用，且作用大小为 1.14；基于影响城镇化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四个影响因素对城镇化水平的敏感程度分析，得到中部地区应走创新驱动之路，同时也应进一步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物质资本上的差距。

6. 市场力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的最主要驱动力，其次是行政力。此外，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三省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主要依靠市场转换来完成，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三省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主要靠政府宏观调控来完成；除江西省外，其余省份外向力与内源力的驱动作用均小于行政力与市场力。

7. 为更好发挥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机制、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四化”融合发展。

前言

1900 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二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任保平，2010）。第一次是 1949 年的政治制度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向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第二次是从 1978 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与经济转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转变，带来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大多数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与思考，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其作为长远发展的新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向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就其重要程度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看作是决定现代化命运的第三次重要转型（任保平，2010）。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由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衍生而来的，经济转型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被首次正式提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十七大报告给出了转变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三个方向，十八大报告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 and 更具体的回答。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被重点提及两次，第一次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是“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胡锦涛，2012）。从十七大报告中仅仅局限于“区域协调发展”，到十

八大报告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再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与动力，可以看出城镇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核心作用。正是基于上述论断，本报告以中部地区为例，分析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书首先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 1978 ~ 2013 年间全国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分析，分别就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测算、微观机制、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最后提出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6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问题

——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 / 12

第一节 需求结构失衡	12
第二节 产业结构失调	21
第三节 资源环境压力大	25
第四节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2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3

第三章 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

——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 / 35

第一节 经济发展质量评价	35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测算	5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72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机理：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 / 73

第一节 研究综述	73
第二节 理论假说	77

第三节 实证分析	7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8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分析：资源有限性的 约束分析 / 90	
第一节 研究综述	90
第二节 资源尾效分析	91
第三节 要素贡献率分析	9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0
第六章 城镇化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与作用分析 / 102	
第一节 研究综述	102
第二节 机制分析	104
第三节 动力学分析	106
第四节 影响因素分析	11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22
第七章 城镇化质量的动力因子分析 / 124	
第一节 城镇化质量评价	124
第二节 动力因子分析	12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33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135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35
第二节 政策建议	138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142
参考文献	145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 背景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1978~201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长率均值达9.77%，保持了较为平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建设世界经济强国的新的历史阶段（洪银兴，2010）。在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新特征：首先，我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2009年，我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外汇第一大国，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次，虽然人均GDP排名仍居世界百名之后，但根据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经济体量越大，其发展能力相比中小经济体则越大，特别是在当前的举国体制下，大国经济的优势与作用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具备世界经济大国的敏锐判断与创新思维，科学定位经济发展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新的阶段上创新发展模式，推动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转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发展十分必要。由于资源环境有限性的约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粗放的要害利用效率下不能持续，新的增长因素与驱动力量的形成是向世界经济强国转变的迫切需要。2013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电耗分别同比下降3.70%、5.40%，万元GDP用水量为121立方米，同比下降6.50%，三项指标虽不断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消耗高企而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另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不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为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提高创新能力及生产效率。2010年，我国的三次产业比例为10.10:46.80:43.10，同年全球平均水平为2.90:27.00:70.10，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为1.50:25.10:73.40，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为9.70:34.30:55.90。虽然2013年中国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9.40:43.70:46.90，但是无论是与发达经济体还是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在三次产业比例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协调问题，具体表现为农业比重偏高、仍以基础农业为主、基础仍然薄弱，工业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低、产业竞争力较差，服务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特征。我国产业发展战略一直采取模仿与跟随战略，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向超越战略转变（洪银兴，2010）。

第三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是，我国工业化文明一直以“以物为本”的方式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与严重的生态失衡。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连年增加，我国气候异常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也在同步增加，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13年1月，雾霾笼罩了我国中东部的大多数地区，而且雾霾出现的次数也逐渐增多。2013年1月14日，清华大学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我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王东年、文远怀，2014）。现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虽然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态安全受到危害，环境与资源利用的平衡体系遭到破坏。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完成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三方面转型，即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国富（追求 GDP 总量增长）向民富（人民收入增长）国强的转型、科技进步由模仿跟随向创新引领的转型、经济全球化参与方式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型。

1. 由国富向民富国强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以 GDP 增长为发展导向，实施依靠投资驱动的赶超战略。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状况下，中国克服 GDP 崇拜，转变依靠高投资、高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人均收入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提高而增长，但投资拉动的 GDP 赶超战略会抑制人均收入的提高：

一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本质上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依靠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与政府购买的大幅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从而形成挤出效应，抑制民间投资，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率低于经济总量的增加率；二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的同时并未建立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无法有效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及公平性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渐行渐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亟待形成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在经济总量有了较大体量时，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及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必须加快，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首先实现转型。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经济发展目标应由追求国富转向民富国强的提高。随着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民富的目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胡锦涛，2012）。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既要求也反映了发展方式的转型，即实现由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经济驱动力转变。

2. 由模仿跟随向创新引领转变, 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路径的转型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物质要素的大幅投入密切相关, 虽然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已超过世界总量的 $1/4$, 但是投入产出比率一直较低, 而且受到越来越强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有限性的约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走以创新驱动之路, 替代之前主要以要素投入驱动的方式,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进而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 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支撑的内涵, 同时也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胡锦涛, 201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的互相融合与发展, 新科技的发展机遇对各国而言都是均等的。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将面临一场全新的全球化的产业与科技革命。由于经济技术水平的约束与限制, 之前的数次技术革命均被中国错过, 而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 我国有能力也有条件与发达经济体在产业革命与科技创新方面站在同一起跑线之上。特别是, 由于科研创新与技术研发的举国机制, 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在某些高新尖端领域实现率先突破, 科技发展由跟随模仿发展转为引领创新, 甚至有可能在某些关键与重点领域实现超越,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 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实现经济全球化参与方式的转型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外围, 主要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分工中, 依靠剩余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比较优势, 大力引进与利用外资, 通过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以出口导向为主发展经济, 获得了大量外汇, 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并获得了一定比例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上方式虽然可以赢得一定的净出口收益, 但是容易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性, 无法有效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真实技术差距, 而且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加速“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还呈现出固化这种格局的趋势。从目前来看, 建立在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效应明显减弱, 难以为继(洪银兴, 2010)。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大量物质消耗

投入推动的，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不仅带来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产业沦为全球分工的低端，制约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内需扩大（迎春，2010）。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必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步衰减，但是资本及技术要素的生产能力也在逐步增强，上述转型的实现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可能性，表明开放战略也需要实现转变，在更高层次与更广范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依靠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

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必须实现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导向的转变。出口导向是充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主要发展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从而带动国内就业人数增加，增加外汇，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贸易条件改善。正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出口导向战略才得以采用，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洪银兴，2010）。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胡锦涛，2012）。出口竞争优势的提升，需要实现产业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逐步协调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即由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形成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总之，我国创造的“中国奇迹”应该归结于改革开放后正确的经济改革模式之功。中国在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这一历史新阶段与新起点，必须改变之前的思维定式，积极主动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对发展机制、发展基础及发展动力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杨淑华，2009）。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如果不能按照发展阶段的相应变化及不同阶段发展任务与主要矛盾的变化，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则其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陷入停顿、反复，甚至倒退的可能。只有依据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致力于解决各种不同的深层次问题与突出矛盾，着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我国经济才能实现平稳较快的可持续发展。在欣喜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矛盾。在长期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要素积累、资源优势、外向势能逐渐衰减的现实状况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深度转型的迫切需求。环境、资源、收入分配等倒逼机制的存在，促使我国

制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针。基于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和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继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中共十八大报告的经济章节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标题,中肯地提出了中国经济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影响中国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重大抉择,也是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各方面与全过程的一场深刻变革。

第二节 文献回顾

我国政府在总结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尤其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新阶段、新时期中国面临的新矛盾、新课题进行了科学分析,进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面临诸多挑战的日益艰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分析与研究方兴未艾(蒲晓晔、赵守国,2010)。因此,本章对学术界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及评述。

从现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与难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研究。国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循环经济”与 3E(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理念(Boulding K. E., 1968)、《增长的极限》(Meadows D. H., 1972 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 1991)、“低碳经济”等反映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变化与趋势。国内研究基于不同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可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与内涵,如“增长与发展异同论”(蒋作培,2008)、“目标多元化论”(黄泰岩,2007)、“资源效率论”(史晋川,2010)等;(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孟祥仲等,2008;王一鸣,2008);(3)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与问题,如“突出问题论”(吕政,2008)、“体制性障碍论”(吴敬链,2010);(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与政策建议。提出了如节能减排、法律监管、政府规制、以人为本、加强完善市场机制、加大体制改革和进行产品价格改革等方面的对策建议(蔡昉,2008;杨淑华,2009;范恒山,2010;杨素刚,2010)。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界定与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到哈罗德-多马提出的资本的深化与广化,再到索洛提出的技术进步,最后到全要素生产率(邓平、邓娥,2011),反映了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应变化。中国大多数学者对“经济发展”中所主要包含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进行剖析,其中的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如何,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与速度(逢锦聚,2010)。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归结于“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钱淑萍,2008),带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与矛盾恶化(张泰,2008),需要拓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框架下去寻找对策(周叔莲,2008)。因此,关于需求、产业及要素投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朱光华,2008;申广斯,2009;王一鸣,2008;迎春,2010;贾根良,2010;谷亚光,2010;姜作培、陈峰燕,2008;何雄浪、杨继瑞,2008;任保平,2010)。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与经济增长方式有所区别,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何雄浪、杨继瑞,200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转变(蒋志华等,2010),是针对经济增长在新时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在视野和内容上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继承和拓展（唐龙，200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与国际经验

被扭曲的要素价格的纠正、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六大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优先并重点关注的（吕政，2008），而相应的可考虑采取的政策为：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刘世锦，2006）。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许多较为成功的经验。美国、亚洲新兴工业国及日本的主要措施为明确政府在非竞争性领域的职责；强化市场机制在竞争性领域的地位；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挥主导作用；实施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特色的调控措施（高峰，2008）。印度以技术导向和知识积累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第二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王丽，2009）。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

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运作机制不甚了解，布坎南（Jamesm. Buchanan）、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t）、克鲁格曼（PaulR. Krugman）等经济学家均认为中国的经济现象难以用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加以说明，其本身的非典型性较强，对于未来 10~20 年，中国经济是否能继续维持 8% 甚至更快的增长，他们也无法预测。2013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7.70%，较之 1978~2013 年间的平均增速下降了约 2 个百分点，除了国际经济环境形势恶化的原因，未能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原因之一。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以根本转变的原因是驱动力不足（杨淑华，2009；杨冬梅、徐开金，2010）。结合中国人口基数较大及国外需求不振的现实情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应是消费（刘庆宝、未良莉，2007；蒲晓晔、赵守国，2010），而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经济主要动力的消费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此外，完善经